

传统水文化的哲学观照

王培君

(江苏教育学院 院长办公室,江苏 南京 210013)

摘 要 中华传统水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这些宝贵思想对于今天的水事活动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水是万物之源和国家兴盛基础、治理水要统筹兼顾,这是传统水文化关于水的基本认识。择水而居、亲水娱水、吟水歌水、以水为师,反映了传统水文化对人水和谐的价值追求。在治水过程中,古人形成了众志成城、人定胜天的抗争精神,追求道法自然、务实创新,取得了治水的巨大成功。

关键词 水文化 哲学 价值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09)03-0006-03

中华民族与水的联系十分紧密,从一定意义上说,华夏文明的历史就是一部人水关系史。古人在利用水并与水患灾害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与水密切相关并具有中华民族特征的水文化。这些传统的水文化中,有一些属于封建迷信之类的糟粕,但更多、更宝贵的是与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的光荣传统和优秀精神,这些水文化的精髓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对于今天的水事活动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系统全面、辩证发展的科学认识

地球表面约有 70% 以上为水所覆盖,水是人类生存和文明进步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没有水就不会有人类,当然也就不会有人类聚居的城市,不会有人类创造的文明。传统水文化对水的认识是比较系统、全面、客观、辩证的,并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升华。

1. 水是万物之源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水是万物之源,自古就有水生世界的哲学观点。早在公元前 300 年,人们就提出了“太一生水”^[1]的宇宙生成说。先秦时代的管子曾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管子·水地》)管子之后,中国古代许多先哲解释世界的本原,都把水视作十分重要的元素,如著名的“水、火、木、金、土”五行说,把水视为物质构成的五要素之首。水对于人类生存的重要性自不必言,“缘水而居,不耕不稼”(《列子·汤问》),这句话十分形象地展示了游牧文明时代的

生活状态。对于人类基本物质生产来说,水更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保障。公元前 109 年,司马迁在跟随汉武帝参加黄河堵口以后,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水利”概念,明确指出水利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并感慨万分地说:“甚哉!水之为利害也。”(《史记·河渠书》)清康熙名臣慕天颜认为,“兴水利,而后有农功,有农功,而后裕国”^[2]。则进一步深刻阐明了治水、农业生产与国家经济、政治稳定的关系。

2. 水是国家兴盛基础

水旱灾害,关系国计民生。历史上,凡有作为、有进取心的帝王都非常重视水利。历史记载,大禹因治水成功而被人们推举为帝王。司马迁称“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史记·河渠书》),其原因就在于修建了都江堰、郑国渠和灵渠等水利工程。春秋末年吴王夫差开通了著名的邗沟,才得以进入中原与诸侯争霸。西汉建都长安以后,历时 3 年建成漕渠,对于维护政权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隋炀帝修建京杭大运河,使中华民族至今享其利。宋太祖疏通汴河、惠民河、五丈河,让漕运直达汴梁。清康熙临运河,钦定洪泽湖仁、义、礼、智、信坝和里下河地区滚水坝。乾隆亲自撰写《热河考》、《滦源考》、《济水考》、《淮源记》等考证水源地的文章。水问题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只有人水和谐,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3. 治理水要统筹兼顾

对水的治理,传统水文化坚持辩证思维,指出

“治河之法,当观其全”^[3],特别强调整体性和综合性。战国时代李冰修建的都江堰,就是集防洪、灌溉、航运为一体的综合性水利工程。明代潘季驯领导治黄,强调综合治理,全面规划,治水与治沙相结合,并提出了解决黄河泥沙问题的三条措施——束水攻沙、蓄清刷黄、淤滩固堤^[4]。潘季驯治理黄河的思想,体现了系统性、整体性和辩证观念,改变了历来治黄实践中只重治水、不重治沙的片面倾向。具体到一座城市和一项工程,传统水文化同样体现了这样一种辩证思维。以北宋刘彝在江西赣州所建的福寿沟为例,福寿沟是赣州城区排水网络,刘彝根据赣州城西南高、东北低的地形特点,采用明沟和暗渠相结合,并与城区的池塘相串通的排水方式,既避免了沟水外溢,又利用废水养鱼和种植水生植物。福、寿二沟均通过城墙下面的水窗,将废水分别排入章江、贡江。整个福寿沟排水系统,沟系纵横行曲,条贯井然,主次分明,排蓄结合,延用至今。

二、崇水为上、人水和谐的价值观念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命题,千百年来,人类择水而居、逐水而走,人们亲水娱水、吟水歌水,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人水和谐的价值追求。

1. 择水而居,以水为邻

中国城市的建设发展,非常注重周围水环境的选择,几乎都是临江滨河而建。我国古代建城理论中就有“依山者甚多,亦须有水可通舟楫,而后而建”^[5],以及“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6](《管子·上篇·乘马》)之说。周朝公刘选择都邑时“相其阴阳,观其流泉”^[7](《诗·大雅·公刘》),表现出对水源的高度重视。春秋战国时期,齐都临淄建在淄水之滨,鲁都曲阜位于洙、泗二水之间,郑韩故城位于洧水和黄河的交汇处,赵都邯郸有清河、沁河贯流城中,魏都安邑有青龙河在城中流过,楚国郢都更是处于水乡泽国之中。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七大古都,安阳、西安、洛阳、开封、北京、南京、杭州也都位于江河之滨。人们不仅在建设城市、起盖房屋时注意考察周围水环境,甚至死后也要选一处风水好的下葬之地,并由此而兴起了中国的堪舆学。晋人郭璞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8](《葬经》),俗话说“吉地不可无水”“无水则气散,无水则地不养万物”“水深处民多富,浅处民多贫,聚处民多稠,散处民多离”。可见,择水而居、以水为邻的传统已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

2. 亲水娱水,人水和谐

传统水文化中人水和谐的理念,还体现为人们以水为俗、以水为嬉、以水为景的审美取向。在水畔

生活的人群或民族,为表达人与水的亲密关系,常以水为对象或载体举行一些活动。这种亲水娱水的活动,随着时间的延长,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民俗。比如,浙西一带除夕守夜到半夜时分,人们便出门悄悄挑回一担新水——“天地水”,并用此水煮“天地饭”祭祀天地,祈求新年万事如意。类似的民俗节日,还有泼水节(傣族、阿昌族)、沐浴节(藏族)、春水节(白族)、汤泉诗会(傈僳族)等。传统水文化中以水为嬉的文体游乐活动源远流长,屈原《九歌》中的《湘君》《河伯》等多篇,即是对古代大型水上祭祀、娱乐活动的描述。唐宋以来,水戏、水傀儡亦很盛行。龙舟竞渡、划船、冲浪、滑冰、滑雪、游泳、跳水、溜冰等水上竞技,今天已成为世界体育运动项目。中国传统水文化以水为景、以水为美,主要表现为:一是对江、河、湖、海、泉、池、潭、瀑、潮等水景本身的崇拜和景仰;二是构筑水榭、水亭等人文景观;三是创作冰雕、音乐喷泉等工艺美术作品,加以欣赏、把玩。

3. 吟水歌水,以水为师

我国古代思想家们往往能从水性和治水活动中得到修身、养性、处世之道,并升华为治国安邦等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孔子受鲧禹父子治水启发,提出“中庸”的方法论。老子怀着对水的无限景仰,赞叹“上善若水”^[9](《老子·道德经》)。管子从水的特征上看出了人的品行和为政奥妙,指出“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为都居”^[10](《管子·水地》)。荀子曾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11](《荀子·劝学篇》)。哲人们以水论事,以水喻理,以水明志的精辟论见,堪称华夏文化的思想宝藏。水不仅启迪了先秦哲人,还是古人情感心绪的寄托物。细读中国的经典文学,几乎无水不写,写则涉水。当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表达的是生命易逝、年华不再的慨叹。李白“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表露的是如水流般的长恨。苏东坡“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又是何等豪迈、昂扬。至于以水诉相思、写怨女、描柔情、抒胸臆,思乡怀古,描战画斗之作,古今之例,不胜枚举^[6]。

三、众志成城、人定胜天的抗争精神

《周易》指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12](《周易·乾卦》),孔子主张“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13](《论语·子罕》),孟子提倡舍生取义、推崇大丈夫精神,这些中华传统观念体现在水事活动中,就是人类与水利灾害积极抗争的精神。从共工雍防百川到大禹开掘九川,从李冰父子修筑都江堰到刘彻指挥堵复瓠子决口,从潘季驯治理黄河到近代李仪祉水利报

国,中国人民在与水利灾害斗争过程中形成的抗争精神已成为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水患灾害不足惧

水在给人类带来生存、生活必需和便利的同时,也伴随着水患灾害,水利和水害作为一对孪生兄弟共同孕育、推动了中华文明史。古人面对具有巨大破坏力的水灾害,尽管畏惧却没有退缩,始终与水灾害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夸父逐日的传说,隐喻人类与旱灾作斗争的历史。精卫填海的传说,则是人类与水患作斗争的寓言。水患灾害不足惧的精神气概,是传统水文化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对此,广西梧州就是最好的例证。面对年年光顾的洪水,梧州人习以为常,洪水来时人们将一楼的家居用品搬到二楼,仍旧过着往日居家生活,巷陌间穿梭自如的小艇可以完成走家串门、消费娱乐的所有需要。桨声灯影里的骑楼和各家各户二楼窗户外面的系船铁环,共同见证了水都梧州“水淹骑楼荡舟巷陌”的历史。

2. 积极治理水患灾害

古人不仅具有水患灾害不足惧的精神气概,而且还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治理水灾害。《史记》记载大禹为了治理水患,劳身焦思,在外 13 年,三过家门而不入。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提出“无曲防”禁令,以解决修筑黄河堤防引起的纠纷(《孟子·告子下》)。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史记·秦始皇本纪》),将各国黄河大堤连接起来成为一个防洪整体。为防治长江水患,东晋桓温令筑万城堤,后梁开平年间筑“寸金堤”,北宋熙宁、南宋绍兴筑“黄潭堤”,明成化筑“新垵堤”,弘治筑“文村堤”,到嘉靖年阻塞荆江最后一个穴口——内荆河穴口,长江荆江大堤建成。几千年来,古人建大坝、开沟渠,积极投身水患治理,反映出一种献身精神、抗争精神。

3. 众志成城共克水患

管子说:“善为国者必先除五害。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风雾雹霜一害也,厉一害也,火一害也,此谓五害。五害之属水为大。”(《管子·度地》)因为水灾频繁,危害严重,特别是几条大江大河的泛滥,更是直接危及大半个中国,所以,抗洪治水便具有了经常性质和巨大规模,成为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和公共决策。大规模的治水活动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组织动员各方面力量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同时,还要顾全大局,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因此,为了除水患、兴水利,必须加强组织与组织、人与人、人与组织之间的协作和配合,万众一心,团结治水,必须顾全大局,从整体出发处理治水中的利益冲突,必要时甚至要牺牲局部利益以保证全局利益。

久而久之,这种团结协作、顾全大局的精神便深化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思想方法和工作方式。

四、道法自然、务实创新的治水实践

在治水实践中,古人道法自然、科学务实,根据水性、水情、地势,或依托地势顺势而为或顺应水利运动规律,治水取得了较好实效。

1. 科学务实态度

大禹“疏川导滞”(《尚书·洪范》)的治水方案是依水势而为,用疏导代替堵塞。所谓“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洫,距川”(《尚书·益稷》),就是寻其主流,加深加宽,同时把涣散的细流决通,使归河槽,做到“水由地中行”(《孟子·滕文公下》),由主水道流入大海。这样经过人工疏浚后,改变了河流的自然状况,不仅消除了水患,且原来洪水漫溢之地逐渐干涸后也成为耕地。从消极防洪发展到积极治河,大禹经过了十多年时间,终于制服了汹涌的洪水。沟通湘江和漓江的灵渠工程,则是依地势而为。湘江和漓江在广西兴安境内东西相距 25 km,在秦时直接开凿运河连接两江是相当困难的。古人经过精心勘测,巧妙地利用了湘漓上源相接近的地形特点,修建铧嘴,将湘江一分为二,又劈开分水岭,将南流的一支导入漓江,再配合修建溢流天平和调节航深的斗门等设施,达到了跨流域引水通航目的。

2. 创新创造能力

古人治水的创新创造能力,体现为治水思路 and 战略创新、治水手段和工具创新等方面。首先看战略创新,中国虽然河流众多,水系庞大,但主要是东西向的河流,水系之间有分水岭相隔。为了弥补天然河道的缺陷,自春秋战国以来,历代王朝纷纷投入巨大力量开挖运河,如春秋时吴国开凿邗沟,战国时魏国开凿鸿沟,秦代开凿灵渠,汉代开凿渭渠、汴渠,三国时曹操开凿白沟、平虏渠,西晋开凿杨夏水道,隋代开凿南北大运河,元代开凿京杭大运河,等等。这些运河的开挖都不是着眼于一条河流、一个区域的水利问题,而是着眼于整个流域,甚至是几个水系来统筹考虑,体现了一种恢宏战略、创新思维。再是工具及技术的创新,建于公元前 256 年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由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宝瓶口引水口三大主体工程 and 百丈堤、人字堤等附属工程构成,科学地解决了江水自动分流、自动排沙、控制进水流量等问题。当时没有水泥,这么大的工程都是就地取材,用竹笼装卵石作堰,费用较省,效果显著。都江堰的创建,以不破坏自然资源,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服务为前提,变害为利,使人、地、水三者高度协调统一,体现出一种先进的治水理念。(下转第 17 页)

虑苏联这些做法的利弊如何,不能照抄照搬^[1]935。1956年3月19日他再次提出要吸取苏联的教训,“苏联内政错误主要是没有把农业搞好,粮食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似乎太偏重于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苏联轻工业几十年无改进。工轻重如何摆是个大问题,值得从中吸取教训^[1]1015。

当然,张闻天对斯大林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并没有就此否定。他认为:“斯大林对苏联工业化作了贡献,为苏联国防力量奠定了基础。苏联最后战胜德国法西斯是靠三十年代建立的工业基础,这也是应该肯定的”^[1]1015。

综上所述,张闻天之所以能形成极为丰富和深刻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与他长期深入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长期深入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问题,长期深入社会实践,充分吸收其他国家成功经验分不开的。张闻天的做法对新时期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张培森.张闻天年谱:下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上接第8页)

3. 可持续开发理念

传统水事活动,坚持兴利与除害并举,开发与节约并举,建设与管理并举,体现出一种辩证科学的水管理思想。管子说过:“食之所生,水与土也。”(《管子·尽藏》)已经认识到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与条件。对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水资源,《吕氏春秋·义赏》中所说的“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就非常明确地表达了反对过度开发和使用,以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观点。周文王伐崇侯虎时,曾颁布了一道讨伐令,其中有“毋填井”条款,以军令禁止填塞水井。汉元帝时南阳郡守召信臣制定了《均水约束》,告诫人们要节约用水、合理用水,并防止水利纠纷发生。

古人十分重视水利工程的维护维修,都江堰自创建以来,就由李冰确立了一年一度、从不间断的对渠首工程进行维修的制度——岁修。都江堰的有效管理保证了整个工程历经两千多年依然能够发挥重要作用。荆江大堤,从明末民修民防到清代官助民修,再到民国时期官绅合办,无论体制如何变化,对荆江大堤的维护一直没有间断。江浙海塘经历一千多年发展,形成了一道总长650余km的海防长城,历代都设立有专门政府机关对海塘进行管理。

老百姓日常生活也体现出强烈的节水意识。山西陕西地区以及皖南古民居都是半边盖,其乡语云

[2] 《回忆张闻天》编辑组.回忆张闻天[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325.

[3] 列宁.列宁选集:四[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 张闻天.张闻天文集:四[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5] 列宁.列宁全集:二十七[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267.

[6] 列宁.列宁全集:四十二[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34-335.

[7] 列宁.列宁全集:四十三[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245.

[8] 李涛.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143.

[9] 转引自朱阳,郭永钧.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34.

[10] 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67.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63.

[12]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室.陈云文选(一九五六——一九八五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3.

“乡间房子半边盖,省工省钱省木材,遮风避雨又御寒,冬暖夏凉好运来。”说的就是雨水资源珍贵,肥水不流外人田,要收集到自家来。类似例子,还有云南丽江三眼井。所谓“三眼井”,是“一泉顺流成三潭”:上潭为源出之潭,专供饮用;中潭专供洗菜;下潭专供洗衣物。三眼井水顺势而往低处流,既卫生又节约,十分符合当今“节约即环保”理念。这些古代建筑和生活习惯都说明了古代先民节约水资源的一种意识。

当然,传统水文化中也存有一些封建迷信思想,比如传统水文化奉水为神,阻碍了对水的科学认知;考虑陆地多海水少,考虑表面水多地下水少,等等。但是,这些糟粕和不足瑕不掩玉,不能掩盖中华传统水文化的灿烂光芒。

参考文献:

[1] 江林昌.考古发现与先秦两汉学术文化[J].社会科学战线,2003(2):214-220.

[2] 靳怀埏.中华文化与水[M].武汉:长江出版社,2005:24.

[3] 谭徐明,周魁一.经世致用之学:当代水利史研究新进展[J].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9(4):1-4.

[4] 转引自王化云.我的治河实践[M].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416.

[5] 金戈.华夏环境观与水(二)[J].海河水利,2004(4):67-70.

[6] 李德民.象同喻反:水意象的辩证解读[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0(2):23-26.